

概 述

石家庄市郊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市区四周，其内环分别与城内各区交界，外环西依太行山与获鹿县相连，北濒滹沱河与正定县隔河相望，东南与栾城县接壤。境内辖振头、西里、留营、西三庄、杜北、谈固、槐底、孙村 8 个乡镇，大郭、赵陵铺、南高营 3 个镇，80 个行政村，26 个居民委员会。1989 年全区共有 75433 户，237887 人，其中城市 13010 户，51215 人。绝大部分为汉族，此外有蒙古、回、苗、壮、朝鲜、满、土、达斡尔、锡伯、羌等少数民族。

郊区历史上属获鹿、正定两县辖地。1939 年建石门市时，从获鹿、正定两县划入 59 个村归市辖，1941 年 8 月又将这些村分成三、四、五、六区，为市郊。1947 年 11 月 12 日，石门市解放后改为石家庄市五、六、七、八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市郊各区屡经分合撤建。到 1965 年 1 月 5 日，东、西郊合并，正式建立石家庄市郊区，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延续至今。

郊区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古文明。在白佛、白佛口、谈固、上京、北焦、北杜等许多村落，都曾发现过远古人类生存。进化的印记；从商代起，这

里就开始有了最早的行政区；春秋后期，更有古代名城——东垣。明朝重修毗卢寺（初建于唐代）绘制的北殿壁画，距今已有六、七百年，但其色彩仍艳丽夺目，栩栩如生，为我们展示了绚丽多彩的古代人物画卷。它不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才智，也是我国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

郊区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汉代，对统一祖国南方做出杰出贡献的南粤王赵佗，三国名将赵云，金、元名医李杲，明朝兵部侍郎崔应麒等，都是古代郊区儿女的杰出代表。元代名将开国元勋史天泽，久在真定为官，至今他的后裔仍生活在郊区。郊区近代更有抗日名将刘克信、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梁志超为国捐躯。

勤劳勇敢的郊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1926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郊区南高营一带就有党的基层组织活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曾在石门市东北和西南近郊农村发展党员；组织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开展内线工作。当时地处市郊于底村的于底感化院，则是处在敌人心脏的红色别动队。在解放战争中，郊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

支前，为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郊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共有 181 名郊区儿女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郊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英名，他们的事迹将永垂青史！

郊区全境在滹沱河冲击扇形平原上，地势平坦，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海拔高度自西向东从 93 米逐渐降至 64.4 米。

郊区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土壤大部分为褐土，土质肥沃，雨量集中，无霜期长，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还有少量谷、豆、薯、高粱等杂粮。经济作物有西瓜、花生、芝麻、棉花。随着城市的发展，自 70 年代中后期郊区蔬菜生产发展迅速，种植面积、生产品种不断增加。另外，还利用河滩沙地开垦了大片果园、苗圃。

郊区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解放前，主要靠人畜耕作，生产水平很低，粮食平均亩产 184 公斤，棉花平均亩产 20.5 公斤。解放后，郊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棉产量不断提高。到 1958 年粮食平均亩产 340.7 公斤，棉花亩产 51 公斤。1959 年后，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接着又遭受了连年自然灾害，到 1961 年粮食亩产降至 240.5 公斤，棉花亩产仅 26.45 公斤。1964 年后，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农业生产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到 1965 年全区粮食亩产 426.5

公斤，棉花亩产 51.7 公斤。1965 年至 1978 年由于强调“以粮为纲”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粮食生产得到较快发展，产量也不断提高。1970 年郊区粮食亩产已上 500 公斤，到 1978 年已达 688.9 公斤，比 1965 年增 262.4 公斤，平均递增 3.76%。此间，棉花生产由于受到病虫害的危害，产量和品质不断下降，到 1976 年亩产仅有 14.2 公斤。为了适应城市人口增长对蔬菜的需求，自 1977 年郊区取消了棉花生产。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郊区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投入的增加，粮食作物产量稳步提高。到 1989 年，全区粮食总产 30424 吨，平均亩产 707 公斤，是解放初的 4.5 倍。

石家庄是个新兴城市，市郊的蔬菜种植是随着城市的扩建、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满足人民对蔬菜的需求，逐渐发展起来的。解放前只在个别村庄有个体户种植，1949 年也仅有 5000 余亩。到 1965 年菜田面积发展到 28029 亩，占耕地面积的 16.6%，种菜的村庄发展到 52 个。1968 年 11 月，河北省省会迁到石家庄，从此石家庄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形势，进一步推动了郊区农业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1970 年菜田面积发展到 30983 亩，占耕地面积的 18.3%。1973 年菜田面积达到 33798 亩。1976 年为更好地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郊区建蔬菜专业村 31 个，以生产蔬菜为主。蔬菜专业村的菜

田面积平均占本村耕地面积的 70%以上。70 年代中后期，是郊区粮、棉面积减少，菜田面积增加较快的时期，尤其是 1976 年后取消了棉花生产，扩大了菜田种植。到 1977 年，全区蔬菜面积上升到 53585 亩，比上年增加了 8490 余亩，从而郊区农村逐步由传统农业向城郊型农业迈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郊区菜田面积在经历了短期相对稳定后，到 1989 年达到 5.94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52%。同时，进入 80 年代后，蔬菜品种也由 70 年代的 30 多种增加到 50 多种。在蔬菜种植技术上不断学习外地经验，引进新、优品种，逐步减少了大路性蔬菜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群众喜爱的早、鲜、细、嫩、新、特蔬菜。在种植方法上也改变了过去全部露天种植的老办法。采用了阳畦、地膜覆盖育秧和小暖窖、温室、大棚种植的新措施。蔬菜生产实现了四季常青，常年供应不断。到 1989 年，全区蔬菜年产 342277 吨，平均亩产 5676 公斤，基本满足了城市人民生活需要。

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变革，目前郊区农业生产已逐步由过去的以人畜力为主转向机械为主。到 1989 年全区共有各种农业机械 1610 台，总动力 15.5 万马力；农用汽车 822 辆，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郊区畜牧业在历史上一直附属于种植业，畜产品产量很低。1949 年，全区有大牲畜 24629 头，羊存栏 3592 只，猪 21124 头，畜牧业年产值 141 万元

(旧币)。解放后，虽有发展，但由于受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速度一直十分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环城农村大量鲜活畜产品直接进入城市市场，推动了全区畜牧业的发展，也使郊区逐步摆脱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向开放型、商品化转变。畜产品产量、品种、商品率迅速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进一步调动了他们从事养殖业的积极性，也加快了郊区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到 1989 年全区共有大牲畜 2132 头（机械化生产，使役用大牲畜减少），年出栏猪、牛、羊、鸡、兔等共 10377365 头（只），禽蛋 4960 吨，鲜奶 2578 吨，蜂蜜 4200 公斤，鱼 12 吨，丰富了城市市场。1989 年全区畜牧、水产业年总产值 4480 万元，是 1949 年的 31.7 倍。

林果，解放初只在农户庭院和路旁少有种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林果业的发展也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经历了起落。从 1949 年起，郊区曾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群众开展春季植树造林活动。但 1958 年以后，受群众运动的影响和“以粮为纲”思想的局限，人为地砍伐了许多树木。到 1962 年底，解放后营造的 5830 亩农业防护林仅存 427 亩，四旁植树由 1959 年的 56 万株降至 15 万株，严重挫伤了群众植树的积极性。1963 年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农村经济政策，并进一步明确了果木的权属，重新激发了群众种植果、木的积极性。到 1965 年全区防护林发展到 1159 亩，新开垦河滩荒沙地建果园 2748 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

“搞活经济”政策的鼓舞下，郊区的林果生产不断扩大。到 1989 年，全区有防护林 6455 亩，四旁植树 986741 株，果园 18979 亩，苗圃 59 亩。林果总产值 549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27.9%，年产鲜果 6963 吨，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京、津、内蒙、东北等地。

解放前，郊区的工业主要是一些从事个体农副产品加工的手工业作坊，工艺十分落后。解放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虽然曾发展过一些简易的手工工厂，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农机具和农机配件，但因受“以粮为纲”思想的束缚，又受市场、技术等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文革十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生产又屡受挫折，郊区工业一直未得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开了郊区经济封闭的大门，也吹开了农民头脑中的智慧之门。昔日终日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开始在开办工业脱贫致富中大显身手，乡镇企业如旭日东升异军突起。在城乡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凭借靠近城市的优势，乡（镇）、村企业迅猛发展。1989 年全区乡村企业已发展到 1040 家，不仅遍布全区，而且各行业门类齐全。有机械加工业、制造业、修理业，还有电子、化工、建材、纺织、卫生、医药、服装、食品、旅店等行业。共拥有固定资产 4.6 亿元，从业人员 62875 人，总收入 15.3 亿元，上缴税金 2869 万元，纯收入 4.4 亿元。有区、乡企业 65 个，年工业总产值 11020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9237 万元，利润 604 万元。全区有 230 家工业企业纳入了城市大工业生产体系，91 种产品分别被评

为部、省、市优质产品，其中 2 种荣获尤里卡世界博览会银奖。近年来郊区乡镇企业已逐渐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解放前郊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供应，主要靠集市和小商小贩，十分不便。解放后，逐步形成了遍布全区乡（镇）、村的商业网点，到 1989 年全区共有 11 个供销社，93 个门市部，干部职工 1500 人，经营品种两千多个。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搞活经济”，为城乡建设服务的精神指导下，郊区努力开拓市场。自 1985 年先后新建、扩建大、中型综合商场 5 座 8600 平方米。扩大了经营规模和实力，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1989 年郊区供销商业销售额 6465.5 万元，是 1980 年的 2.4 倍。上缴税金 106.9 万元。

商品经济的发展，开阔了郊区人民的视野，商品交换是没有地域界限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农民已不满足在国内做生意，他们开始把眼光瞄向了国际市场。郊区外贸在全国商品经济大发展中，于 1980 年起步，到 1989 年已发展到有 9 个乡，33 个厂家，共 43 个出口产品。并相继打入美、日、原苏联、加拿大、西欧、东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郊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1989 年人均收入 1149 元，是 1946 年的 38.3 倍。人民的衣、食、住、行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从 80 年代中期，不少农户先后建起两层居室，截止 1989 年底，人均住房已达 1.7 间，25 平方米，其中楼房 53013

间。耐用消费品也开始大量涌入农村家庭，据 1989 年统计，全区农村家庭拥有彩色、黑白电视机共 51546 台，洗衣机 36798 台，收录机 25865 台，电冰箱 6699 台，电风扇 54356 台，摩托车 1882 辆，照相机 2844 架。群众储蓄额 1097 万元，人均 1065 元。

解放前，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窒息了农民的思想，残酷的阶级压迫，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沿袭传统的生产方式，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一年四季难得温饱。在他们心中哪会有科技的位置？解放后，又由于对知识的偏见，科技推广和科技应用在农村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农村基本上一直依靠经验搞生产。直到 1981 年，郊区仅有相当技术员水平的人员不足 200 人。“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的动力”这一真理逐步在各种经济活动中，被干部、群众所认识，各级求贤若渴，热情空前。从 1984 年以来，区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广招人才，先后同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 80 余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以及 700 余家国营大企业建立了技术、人才、信息联营、协作关系。1987 年以来吸引、招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112 人，到 1989 年底调入 106 人，并建立了区、乡、村三级科技服务网。至 1989 年，乡、村两级科技服务组织已有 107 个，全区科技示范户 1000 余个。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大大促进了全区经济的发展。自 1987 年以来，全区承担 98 项省、市科技开发和星火计划科研课题，已完成 68 项，其中 15 项分别在国际、国内获奖。

科技的力量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知识、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促进了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解放前，郊区只有 48 所小学，学生约 3000 名，教职工 150 人。到 1949 年也只有完小 9 所，初小 49 所，在校学生 5000 人，教职工 193 人。且学校条件很差，教室多为破旧寺庙祠堂。经过建国后十几年的努力，到 60 年代中期，郊区的教育事业已初具规模。1965 年全区有完中 7 所，在校学生 3245 人，农中（初中）13 所，在校学生 1580 人；小学 89 所，在校学生 19851 人，入学率 94.16%。文革期间，郊区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在“革命”、“造反”的口号下，学校一度停课，正常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一些缺乏辨别能力的青少年，在“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教唆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昔日的师长，许多校长、教师受到批判。受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学生学业荒废，打斗之风盛行。学校的桌椅、门窗、教具损害严重，整个郊区竟然没有一处象样的课堂。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才重新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几次调整，到 1989 年底，全区中、小学共 86 所（经撤并数量有所减少），800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30676 人，教职工 2088 人（其中教师 1681 人）。校舍也有了较大改观，几年来全区小学改建校舍 16 处，新建三层教学楼 33 座。电化教学设备也开始步入课堂。学前教育普遍受到重视，全区有 68 个村建立了幼儿园，幼儿入园率达 63% 以上，人数达 11109 人。随着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望，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质量也逐年

提高。大力发展教育，为郊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后备力量，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郊区注意保证教育经费逐年增长，1989年已达到612万元，占全区可用财力的32.4%。

郊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50年代个体联合诊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有综合性区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11个乡镇卫生院。到1989年底共有床位378张，医务人员321名。并增添了许多大型、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全区80个村，村村有卫生所，共有乡村医生239名，经考核，127名取得初、中级医师职称，他们在防疫灭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郊区民间很早就有传统的文体活动，多在春节或庙会期间进行表演。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文体活动也逐步广泛开展起来。尤其是近年来，全区广泛开展了“春节群众活动月”活动，不少村集资修建活动室，购置器材、服装。当春节临近之时，各村“咚咚”的鼓声象春雷，震撼长空。不仅鼓点紧凑，以钹伴鼓，阵容整齐，气势磅礴，而且动作欢快，变幻异常，振奋人心。这项活动原为男儿“专利”，现在鼓手中又增添了不少巾帼英雄，飒爽英姿，令人羡慕。在体育方面，近年来，郊区不仅召开了全运会，职工运动会，而且又增添了农民运动会，在提高全区人民运动水平和身体素质方面发挥了作用。1985年3月，在获

鹿召开的全市农民运动会上，郊区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1988年4月，又获市农民运动会男子组（田径）第一名。

郊区境内交通四通八达，通讯快捷方便，为发展城乡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方便。京广、石德、石太等铁路干线穿越郊区，还有石正、石栾、石藁、石铜、石邯、石获、石岗、仓安、红旗、友谊等公路经郊区通往市内各单位、大专院校和四周各县。此外，每日还有上百次往来班车经这里奔向四面八方。市内的1、2、3、4、6、8、9、10等路公共汽车均在郊区设站。郊区各乡之间皆有乡村公路相连。近年来电信事业飞速发展，郊区的直拨电话能直接与国内外联系。它们是维持郊区机体充满活力的大动脉，一刻不息地向全区传播各种信息，输送营养。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趋势和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郊区发展城郊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背靠京津，环绕省会又为郊区的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3万郊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奔小康，为全区经济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郊区，已经摆脱了愚昧和贫困，郊区人民正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双手描绘更加壮美辉煌的发展蓝图。我们相信她的明天一定会更加文明，更加繁荣，更加富足，更加美好！

大事记

春秋战国

春秋后期，滹沱河南岸兴起古代名城东垣邑（属中山国，在现郊区东古城）。

公元前 408 年，魏将乐羊率军攻中山国，三年后灭中山。

公元前 387 年中山国桓公复国。

公元前 305 年，赵武灵王攻中山，取东垣等城邑。

公元前 296 年赵灭中山。

公元前 228 年秦攻赵，两军在滹沱河沿岸交战。秦灭赵后，自东垣广征民役、兵丁越五岭攻南越。

秦、汉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在东垣设县，属巨鹿郡。

公元前 204 年析巨鹿郡北境置恒山郡，郡治移至元氏县故城村，东垣属恒山郡。

西汉初，这一带屡经战乱。公元前 197 年刘邦亲率大军到东垣平叛，并将东垣改为真定县（治所在今郊区东古城）。

以后这一带曾先后属恒山国、恒山

郡、常山郡、常山国、真定国。

新莽时期，真定改称“思治”。

刘秀与王朗军队多次战于常山、真定。

东汉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真定王刘扬反，被汉军剿灭，刘扬被杀，其子被立为真定王。

东汉末年，黑山农民义军起于真定。

魏晋、南北朝

三国时，真定属魏冀州常山郡。

晋初，常山郡治所从元氏迁往真定。

公元 310 年，羯人石勒率军攻取常山。

公元 337 年符秦、后燕争夺常山、中山，相互征战，并从常山广征民役。

公元 350 年，前燕攻冉魏至常山。

公元 384 年，前秦苻谶以常山降后燕。

公元 396 年，北魏道武帝攻占真定，并与后燕多次在此交战，真定守军死亡数百人。北魏控制常山后，大批吏、民、工匠被迁往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隋、唐、五代

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石邑县治迁往万夏村（今郊区振头）。

大业初年（公元 605 年），真定县治迁往安乐垒（今正定县）。

唐初，唐军与窦建德、刘黑闳的农民政权多次在恒州等地交战。

公元 679 年，突厥 10 万大军进犯恒州。

公元 755 年 12 月，史思明叛军破常山，杀万人。

公元 756 年 2 月，唐军出井陘赴常山，常山团练杀叛军归唐，唐军驻常山。6 月史思明部扫荡河北，破常山杀数千人。

公元 759 年，常山、恒州一带沦为叛军伪政权。

公元 820 年恒州改称镇州。

公元 923 年镇州为北都，升真定府，后复称镇州。

公元 942 年契丹入侵，镇州主帅杜重威降。

宋、元、明、清

公元 973 年，废石邑县，将其辖区并入获鹿县。

公元 979 年，宋太宗从镇州募兵伐契丹，大败。

公元 986 年，宋太宗自镇州等地抽调兵民组织“雍熙北伐”，几遭全军覆没。

公元 1048 年，镇州升为真定府。

靖康之变（公元 1126 年）金军围

真定府，真定一带军民顽强抵抗，誓死不降。

公元 1214 年，蒙古军攻占真定，史天泽在真定、获鹿一带与金军武仙大战。

公元 1260 至 1330 年，真定一带连年遭受蝗、旱、涝、雹灾，饥民大量外流。

公元 1334 年，真定一带贫苦人民奋起反抗元统治者。

元末明初，河北真定一带战乱频繁。

明洪武九年（公元 1376 年），朱元璋曾迁山西及河北真定无田产的人到风阳屯田。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 1388 年），从山西泽、潞二州向真定等地移民。

靖难之变时，皇室争帝位曾在真定等地频繁交战。

永乐十四年（公元 1416 年），明王朝再次从山西向真定等地移民。

公元 1723 年，清雍正帝（胤祯）为避名讳将真定改为正定。

清朝同治后期，捻军曾在正定一带活动，许多农民加入义军，后遭清廷残酷镇压。

公元 1900 年，德、法军队西犯井陘，井陘、获鹿一带各村义和团民众顽强抵抗。

中华民国

1925 年 3 月，市郊孙村人梁志超在正定省立七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郊区有了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6 年 4 月，市郊高家营（即今南

高营)高小党支部建立,这是郊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

1927至1939年,正定、获鹿有大批穷苦人闯关东迁往东北三省。

1928年晋、奉两大派系军阀多次在石家庄以西地域交战。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正定、石家庄,沿途残杀人民。

1939年10月,中华民国行政委员会批准建石门市。市区范围:东至北宋、尖岭;西至大马村、大郭村、西王、大谈、西岗头;南至五里庄、塔谈、塔冢、东王;北至大安舍、赵陵铺、董家庄、西古城、东古城。

1941年3月8日,又从正定、获鹿划入部分村庄归市。并将辖区分为一、二、三、四、五、六区,其中三、四、五、六区为市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石门市被国民党占领。

1947年11月6日,解放石门市的战斗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占领了柳林铺、柳辛庄、南翟营、北翟营、北宋、白佛、大安舍、小安舍、东岗头、留营、大谈、小谈、玉村、西三教、塔谈和大郭村机场。

1947年1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焦、城角庄、东三教、槐底等村,并突破振头镇防线。

1947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迅猛插入北焦,全歼守敌。

1947年

11月12日,石门市解放。市郊三、四、五、六区也随之解放。

11月21日至23日,四区各村进行民主选举,共选出代表68名,并召开区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会后各村组织、成立贫农团。

年末,获鹿县田家庄村划归石家庄市第六区。

市郊各区先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区工作组织和区人民政府。

1948年

1月1日,原石门市郊三、四、五、六区分别改为石家庄市五、六、七、八区。

1月22日下午,五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破坏国民党人员登记工作、残害人民的日伪汉奸、特务范振兴死刑,即日执行。

1月23日,各区更换新居民证,将原国民身份证收回。

2月16日,各区开始土地改革运动。

6至7月间,邓颖超率妇女工作队,自西柏坡来检查工作,并先后到大郭村、塔冢村看望中央工委派去的“土改”工作队员和参加工作队的歌唱演员郭兰英、作家丁玲。并帮工作队平息了少数地富分子反攻倒算事件。

1949年

1月10日,各区分别召开区、村干部扩大会议,布署结束土改工作。会后,各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村进行土改收尾。

4月20日,五区柏林庄妇女主任王

月当选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妇女代表。

4月底，各区的基层政权——村人民代表大会和村人民政府诞生。

7月28日，环绕市郊西北部的石宁河堤全部修复，全长27公里，顶宽5米，高2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日，各区人民载歌载舞集会庆祝“开国大典”，并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座谈会。

10月14日，各区小学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组建“少年先锋队”组织，发展少先队员，并逐年取消小学学生会和儿童团组织。

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幻灯展览队先后三次到郊区农村巡回放映《百万雄师下江南》、《开国盛典》、《新农具》、《张太师》、《石家庄市各厂第三次生产竞赛介绍》等幻灯片。

12月，各区的村党支部开始公开活动。

1950年

3月4日，六区刘大美、七区劳模白克信、八区劳模冯春凤等，赴北京参加农研所米丘林学会第一届年会，并被聘请为华北农研所名誉研究员。

4月7日，五区小沿村劳模鲍老初、鲍银斗、鲍银福率先组织成立第一个互助组后，全村相继又成立了8个互助组。

5月10日，五、六区妇联干部积极

宣传贯彻新《新婚姻法》。

5月14日至24日，各区先后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听取、通过了各区1949年政府工作报告和1950年工作方针、计划，并选举产生了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区长。

8月22日，市郊四个区合并为两个区。五、八区为新五区，六、七区为新六区。

8月30日，下午5时突降暴雨，同时降雹约30分钟，冰雹最大直径45毫米，受灾面积约2万亩。其中受灾较重的有党家庄、高柱、柏林庄、陈章等村。

10月10日、11日，六区、五区分别召开农业劳模会议，并选出出席河北省第一届劳模大会代表张君琦（留营）、杜书（振头）、庞老可（桃园）、蔡德云（元村）。

1951年

1月29日，一贯道登记工作逐步在市郊展开。

2月18日，市郊两区春节期间大规模开展“抗美援朝”和“揭露一贯道罪恶”的宣传活动。

2月21日，五、六区各村一贯道徒纷纷找政府声明退道（五区729人，六区1535人）。

3月10日，植棉能手梁家瑞、劳模梁银新向全市农业劳模提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倡议。

5月1日，六区有14208人举行游行示威，积极参加和平签名运动。

6月11日，城郊农民积极向国家交

售棉花，受到市政府通报表扬。

6月25日，六区在振头村召开公判大会，反动道首任洛克、刘俊彦及惯匪张蓬英被判处死刑，即日执行。

11月24日，五、六两区在党和机关干部内部分别开展“三反”（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至1952年8月结束。

12月，城角庄村植棉模范梁家瑞种植1.5亩棉花，亩产籽棉745斤，创全省丰产纪录。

梁家瑞、赵明来参加省劳模会议。

1952年

3月27日，西三教赵明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共7户，地55.9亩，劳力：男4，女6，大车、水车各1部）。

4月4日，城角庄梁家瑞荣获全国农业丰产模范，并获中央农业部爱国丰产纪录奖状和奖金100万元（旧币），市政府为他举行了授奖庆功大会。

4月10日，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在五、六区建立第七人民法庭，韩哲五任审判长。

7月7日，下午5时半，降暴风雨，并夹有密集冰雹，历时一时半左右，风速之大为历史上罕见；冰雹有胡桃、茶碗大，造成了人畜伤亡，农作物遭受严重损失。

10月4日，第七人民法庭撤销。

1953年

4月1日至4日，五区取缔反动道会门，逮捕道首2名，管制3名，有

647名道徒声明退道。

4月26日，开始划乡工作，两区各建9乡1镇，同时撤销各村政府。

10月1日，五区以乡为单位召开大会，庆祝建国四周年和抗美援朝胜利，并宣传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意义。

11月29日，两区区委、区政府分别派工作组，深入各村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定》，并鼓励农民踊跃交公粮、卖余粮。

1954年

2月9日，合并五、六区，成立石家庄市郊区。杜清华任中共石家庄市郊区区委第一书记，韩哲五任第二书记，李岩兼郊区人民政府区长。同时，原五、六区人民武装部合并，建立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武装部。

3月31日，郊区召开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名委员组成的郊区人民政府，并选出出席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8人。

4月3日，东、西古城建立了两个合作果园和两个造林合作社。

6月13日，效区广泛开展托儿互助，以腾出劳力投入生产，全区入托率79.6%。

7月11日，连日大雨，河水暴涨，石宁河堤决口，洪水浸入郊区，淹毁农作物70347亩，淹、塌井4721眼，倒塌房屋9307间，死亡6人，伤35人。

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抗洪抢险、

抢修、加固石宁河堤。并号召全区人民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补损竞赛。

7月12日，降雨量251.3毫米，为建国后郊区日降雨量最多的一天。7月份降水量487.9毫米，是建国后郊区降雨最多的月。

8月，郊区广泛开展《宪法草案》宣传工作。

9月4日至5日，市委向郊区党员干部传达“高、饶事件”报告。

9月14日，区委召开乡总支书记、乡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实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并布置宣传贯彻措施。

1955年

3月25日，郊区乡镇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

3月26日，郊区召开首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①积极推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 推广落实定产定购定销 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3月29日至4月1日，郊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108名代表和20名候补代表出席了会议。

4月，郊区开展宣传新《兵役法》活动。

6月8日，郊区清理“抗美援朝”捐款，共75298.97万元（旧币）。

7月1日，石家庄市郊区人民委员会改称石家庄市振头区人民委员会。

9月27日，中共石家庄市郊区委

员会改称中共石家庄市振头区委员会。

12月5日，获鹿县肖家营、前太保、后太保、于底镇、岳村、康庄、张营、孔寨、石桥、西简良10村镇划

1956年

1月5日，建立石家庄市振头区供销合作社。

1月中旬，振头区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合作化。

1月21日至23日，振头区委召开各单位主要负责干部会议，布置清理敌伪档案。

2月16日，振头区合并乡社工作结束，全区由24个乡镇（镇）并为7个。即：振头乡、西王乡、西三庄乡、于底乡、赵陵铺乡、柳辛庄乡、槐底乡。

4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塔谈村、塔冢村。

4月10日，振头区委、区人委制定《关于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

4月16日，振头区供销社范谈村门市部被评为省级先进集体。

5月28日，中共振头区委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6月5日，振头区所辖义堂、吴家庄、元村、范谈、小谈、范村划入市区。

6月16日，振头区人委发出《关于深入广泛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动员群众除“四害”（蚊、蝇、

鼠、麻雀），建立健全卫生扫除制度，加强卫生管理。

6月24日，振头区私营商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公私合营。

7月20日，史际昌任振头区区长。

8月3日至4日，连降暴雨，振头区西部泄洪渠因失修发生多处决口，洪水泛滥入市区，全区农业生产和人民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灾后，区委、区政府领导带领工作组深入重灾区组织社员生产自救。

8月3日，振头区振头、花园、八家庄、东三教、柏林庄、西里、市庄、西焦、北焦、方北、北宋等村镇划入城区。

10月5日，史际昌任振头区区委书记，王正忠兼振头区区长。

11月19日至22日，振头区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0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1957年

1月6日，区委决定：结合农业生产及合作社的巩固提高，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3月24日，振头区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及省委“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指示”的意见》。

5月18日，振头区委决定：全区分两批进行整风，同时，区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

8月底，各乡先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改选乡党委，并选举出席市二届党代会代表。

9月3日，正定所辖南翟营乡的南高营、北高营、十里铺、石家庄、土贤庄、南翟营、北翟营；谈固乡的谈固、白佛、白佛口、廿里铺、大马、南辛庄、三教堂、笨笃庄；栾城县所辖南王乡的南王、宋村、小马、南焦、位同、赵卜口划归振头区管辖。并将它们划为谈固、翟营、南王3个乡（其中笨笃庄划入柳辛庄乡）

11月6日，振头区委作出《关于在农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的补充意见》。

1958年

3月15日至27日，各乡分别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乡政府委员会和政府委员。

3月25日，振头区中小学教职员“整风反右”结束，在767人中划右派分子37人。

5月13日，振头区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7月25日，振头区在全区大力开展“四化”、“两院”活动。即托儿互助化、米面加工集体化、缝纫机械化、做饭食堂化；妇产院、幸福院。

8月27日，振头区全部实现了公社化。

9月9日，获鹿、栾城、正定等县所辖十里尹村、宫家庄、南栗、贾村、郝家营、周通等50个村划归振头区。

9月11日，撤销振头区，合并组建简良、廿里铺、兆通三个乡。并根据政社合一的原则，称卫星、红星、东风人民公社。

10月6日，市委农工部通知，要求10月份在全郊区3个公社全面推行半供给、半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

11月24日，卫星人民公社改称简良人民公社，红星人民公社改称甘里铺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改称兆通人民公社。

11月下旬，兆通人民公社社员实行免费医疗制度。

12月2日，尖岭、土贤庄、谈固、南翟营、北翟营、塔谈、留村、孙村、小沿村、桃园、庄窠、市庄、槐底、东岗头等18个村划入市内。

1959年

1月9日，甘里铺公社抽调民工10069人到光禄山和石家庄市动力厂支援大炼钢铁。

1月13日，石家庄专区所属九县一市的党委第一书记在简良公社建起百亩试验田，各县市根据自己技术特长种植各种作物，劳力由简良公社解决。

1月26日，留营等生产队获1958年河北省粮食丰产先进单位，留村大队获1958年河北省水利建设先进单位。

2月，简良、甘里铺公社民工参加黄壁庄水库修建和石津渠引水工程。

3月2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棉农业技术员17人携带仪器到留营生产队指导、培育棉花“卫星田”。

留营生产队荣获国务院1958年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

4月10日，振头公社获河北省农业丰产红旗单位称号。留营等生产队获河北省农业丰收奖。

5月16日，简良公社迁往振头，更名为石家庄市振头人民公社。

5月16日至27日，甘里铺公社、振头公社、兆通公社分别召开首届党代会和社员代表大会。

5月27日，中央农业部杨显东副部长到振头人民公社留营生产队视察。

6月8日，周恩来总理及随行人员先后到留营生产大队棉花生产方田和槐底大队麦田视察。

7月30日，市人委通知，在石津运河以北，滹沱河沿岸建柳辛庄人民公社。

11月16日下午，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杨显东等负责同志和参加全国棉花跃进增产现场会的19个省市的130多名代表，在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处书记阎健和石家庄市市长马赋广等同志陪同下，参观了留营生产队的棉花丰产田。

11月22日，地、市委、整社试点工作组先后在振二、三、四街，东良厢、尹村进行试点工作。

11月27日至28日，市委、市人委在兆通人民公社召开划方、深翻现场会。到会社队干部参观了万亩棉花丰产田，会后各公社掀起划方、深翻土地高潮。

12月6日，城角，北杜、西三教、高柱、南位等村划市。

1960年

1960年初，郊区各公社按地域位置分别划归桥西、桥东、长安三区管辖，郊区建制撤销。

1963 年

1961 年

12月30日，十里尹村、宫家庄生产大队划归获鹿县。

1962 年

1月，成立石家庄市东郊区、西郊区。并分别建立中共石家庄市东、西郊区委员会和区人民委员会。东郊区周仁杰任区委第一书记，王琳任书记处书记兼任区长。西郊区王殿祥任区委第一书记，李志和任第二书记，张星润任书记兼区长。

5月28日，国棉二厂工人、共产党员王五兴在石津运河为抢救陈章村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0月14至16日，西郊区委召开政治思想工作会议。

11月1日，东郊区委、区人委联合发出《关于认真克服特殊化作风的通知》。

12月17日至18日，东、西郊区委分别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业十六条》等文件，并着重讨论发展农业生产问题。

12月，年底东郊区压缩非农业人口1216人，接受下放职工和家属6764人；西郊区精简干部和职工1086人，接受下放人员5311人。

2月16日，东郊区团委、区武装部联合发出《关于组织青少年和民兵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

4月26日，东郊区委、区人委作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倡计划生育和开展婚姻法宣传的指示意见》。

5月6至9日，东郊区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6月30至7月3日，西郊区和东郊区人委分别作出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西郊区抽调40名干部深入到7个公社17个生产大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7月5日至8日，西郊区、东郊区分别召开共青团首届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区团委和团委书记、副书记。

8月4日至9日，由于连降暴雨，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东、西郊区农作物受灾面积27.4万亩，农作物减产5成，经济损失2000万元。

灾后，两区组织干部群众抗洪救灾，恢复生产。

8月13日，东郊区委发出《立即制止、纠正抢种救灾运动中所出现的分田到户、包干到户的紧急通知》。

10月20日，市委、西郊区委在于底、西三庄两个公社搞粗线条“四清”试点（即：清工、清帐、清财、清库）。

12月7日，东郊区召开首届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2月16日，成立西郊区委“五反、四清”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五反为：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

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1964 年

1 月 7 日，西郊区各公社“四清”工作全面展开。

1 月 7 日至 28 日，东、西郊区分别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向广大干部、群众宣讲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双十条规定。

2 月 19 日，山西省农业参观团在省、地、市有关领导陪同下，到留营大队参观。

3 月 28 日，西三庄工作队在大安舍召开 50 余人参加的干部“洗手、洗澡”（即检查错误）现场会。

5 月 12 日，东郊区召开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0 月 29 日至 31 日东、西郊区分别召开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

12 月 10 日至 11 日，东、西郊区委分别召开区、社两级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省委、市委领导同志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报告。

12 月 21 日，东郊区政法部门侦破留村秘密还香道复辟案。

1965 年

1 月 3 日，市郊农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 月 5 日，东、西郊区合并为石家庄市郊区，机关驻地留营。区辖 11 个人民公社，92 个大队。

3 月 31 日，郊区召开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5 月，张星润代理中共郊区委员会书记，刘雪凌代理郊区人民委员会区长。

8 月 3 日，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党委召开区、社“社教运动”动员大会。王殿祥作了动员报告。

11 月 26 日至 28 日，郊区各公社分别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各公社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12 月 12 日至 14 日，郊区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25 名委员组成的郊区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和区长、副区长。张星润担任郊区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区长。

1966 年

3 月 8 日，早 5 时 29 分，隆尧地震波及郊区，房屋倒塌 115 间，受严重破坏 5000 间，震裂 1.2 万间，砸伤 7 人。震后，区委迅速成立防震指挥部。

3 月 22 日，下午 4 时 11 分、4 时 19 分，连续发生两次地震（震级 7.2 级，裂度为 6 度），全区震塌房屋 23 间，遭受严重破坏房屋 2170 间，震裂 12000 间，砸伤 14 人。

5 月 1 日，区有线广播站建成，并正式播音。

7 月 14 日，郊区农村俱乐部召开批判“文艺界”座谈会。

8 月 16 日晚，郊区社员、干部“社教”工作队员 4000 多人游行，向地委“社教”总团、地、市委递交给党中央、

毛主席的决心书，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8月下旬，在“社教”工作队领导下，农村开始了以烧神像、砸庙宇、收地契、抄“四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为主的“破四旧（旧思想、旧习惯、旧意识、旧传统）”立四新群众运动。

9月5日，郊区杜北公社各大队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开始拆除庙宇、天地堂、各种神像、捣毁香炉、烛钵，并查抄部分书籍、字画。

10月8日郊区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报告大会。

10月12日，槐底大队党支部书记、农业劳模孔令为，作为石家庄地区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凯旋归来，受到地委领导接见。

10月26日，区委决定，对区、社两级机关的枪支弹药进行清理、收缴、严加保管。

10月31日，郊区各公社社员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入市内，热烈庆祝我国核试验成功，并到地、市委递交了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贺信。

11月，市委书记力矢、副书记贾然等人，到郊区留营大队、土贤庄小农场和区机关大院设临时办公处。

12月14日，郊区设立“文革”办公室。

12月16日，区委书记石威受到群众冲击，在会上作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

12月底，大谈农中“钢铁战斗队”和第十中学“八一八”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冲击、进驻郊区机关。

1967年

1月中旬，郊区成立了“区直机关革命造反兵团”和“国家工作人员造反司令部”等群众造反组织。抄了市委力矢、贾然在郊区设立的3个办公室，并对原区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同志进行了批斗。

1月22日，区“文革办”被群众组织查封。

1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区直机关革命造反团的部分干部联合区直“工联司”和红卫兵等群众造反组织抄收了区委、区人委及办公室公章，宣布夺权，并发了“夺权通告”。

2月4日，郊区人武部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人武部政委尹克全面接管了区委、区人委的工作。

4月，市军管会派军队干部到郊区支“左”。

5月26日，郊区成立“农民联合指挥部”（后改名为贫代会）。

7月在报刊发出“揪军内外一小撮”社论后，郊区群众组织开始派性斗争，并出现武斗。

11月15日，成立郊区农代会。

12月17日，郊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

1968年

1月22日，郊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尹克当选革委会主任。全区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活动，并通过了给